



书籍盲盒,能成为生活的“解药”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欣雨
实习生 周家安
记者 郭韶明

今年年初，人间食粮书店店主高贵兵培养了一个习惯，每次出门远行，他都会在高铁上为购买图书盲盒的读者写回信。不同于普通的图书盲盒，人间食粮的盲盒叫作“不盲书盒”，读者下单后需要填写一份名为“对话录”的问卷，问题涉及读书类型偏好、近期遇到的困惑等。读者在收到店主为其“量身定制”的图书时，也会收到一封来自店主的亲笔回信。

事实上，“不盲盒”并非个例。随着近年来盲盒文化掀起热潮，书店、出版社“各显身手”，纷纷推出独家盲盒。为了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有的书店推出生日、新年等“应景”的主题盲盒；也有书店在包装纸、配色上下功夫，将惊喜藏于细节之中。

越来越多读者购买图书盲盒，不仅为书籍本身买单，也为情怀、意义买单。读者隋冰说：“购买书籍盲盒，大概不是为了获得某一本书，而是享受过程中的期待，以及拆开时的惊喜。”于是，许多人选择加入这场“冒险”，与书籍“不期而遇”。

“量身定制”的图书盲盒受到青睐

“文学便当”“精神礼盒”“时间的礼物”……当前，市场上各式图书盲盒层出不穷，如何赢取读者的信任、如何提升产品辨识度，成为书店推出盲盒需要考虑的核心命题。在此背景下，“不盲盒”“半盲盒”等个性化定制的图书盲盒应运而生。

“在收到书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被读懂了。”来自山东临沂的读者陈牧池说，“对面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但感觉对方好像比我自己还了解我。”

来自福建的读者张豆豆也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许多盲盒都利用人们的‘博彩心理’，追求短暂的刺激感，而非注重其本身价值。我期待的盲盒形式是‘量身定制’荐书，而非清库存。”

关于盲盒选书的标准，既然是“量身定制”，读者的需求、体验便是最重要的“指南”。贵阳酒三多书店店主杨不正表示：“我会把自己代他人顾客写的备注，通过那段文字，我大概能了解对方的阅读经验，同时会去感受在那样的生活状态下，我需要什么样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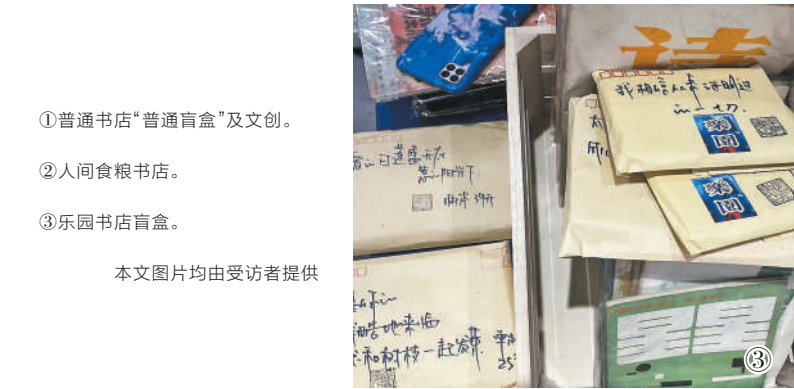
乐园书店店主马圣卓则认为，在尊重顾客要求的基础上，选书时帮他们适当拓展阅读边界，可以营造一些“惊喜感”。“让大家很兴奋的，就是收到的盲盒里有已经购买过的书。很多买盲盒的朋友可能本身就是资深的阅读爱好者，所以有时候需要挑一些相对小众的书籍。”马圣卓说。

徐想想是传播学专业的阅读爱好者，她也表示：“我希望书店的选品不要过于流俗，能够在购买者提供的偏好与知识背景基础上提供一种可能性。我期待的‘缘分’是能和本未曾听闻的书相遇，并‘倾盖如故。’”

实体书店依靠盲盒“突围”

在数字阅读趋势与经营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实体书店的寒冬仍在蔓延，需要一个机会“冲出重围”。盲盒，既是书店“求生”的方式，也是店主“求解”的过程。

借助于盲盒销售，好书可以更好地“流动”起来。对于实体书店而言，线下销售生意不好，图书积压，书店就会沦为“仓库”。尤其在广西



①普通书店“普通盲盒”及文创。

②人间食粮书店。

③乐园书店盲盒。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贵港这样的南方城市，一个回南天过后，书籍就会发黄甚至发霉。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书籍，普通书店的店主唐普决定正式推出“普通盲盒”，为书店争取一些转机。

“今年三四月份有一个小爆发的时期。盲盒在线上获得了一些流量，顺便带动一下其他书籍的销售，已经比预期好很多了。”唐普说，“我不求每一本书都赚钱，但我希望让书流动起来，这样才有机会把‘仓库’变回书店。”

乐园书店店主马圣卓告诉记者：“店内的旧书比例占了很大一部分，很多书留存了几十年还有不错的品相，但其实一直没有被真正完整地阅读过，我觉得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所以希望让这些书都流动起来。”

在书香流动的同时，盲盒也为部分实体书店带来了“生机”。国庆期间，高贵兵在朋友圈分享：“目前为止‘十一’假期实体店营收零。另一边流量猛如虎，小红书上不盲盒已经需要抢了，纯当客服都忙不过来了。”截至2025年10月，人间食粮“不盲盒”销量已逾3000个，评分高达4.8。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在《书店》里写道：“当您想着自己要开一家书店的时候，您得问问自己，您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是任何一门生意都应该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对于酒三多书店店主杨不正而言，这个目标就是让书店活下去。

“只有情怀是开不好书店的，但是没有情怀也不可能开好一家书店。”他表示，“在推出图书盲盒后，书店的经营状况的确得到了改善。”目前，酒三多书店线上售卖盲盒销量已超过8000份，尽管单个盲盒利润很低，但杨不正的理念是“薄利多销”。

除了价值交换，盲盒销售其实也关乎信任的交换。买盲盒的过程，更像是读者与店主之间的一场“双向奔赴”。“阅读其实是很个性化的事

情。”普通书店老板表示，“虽然盲盒不确定性很强，但有一些客人愿意默默信任你，也有顾客开了盲盒会很兴奋地跟你说一声谢谢，这都是对我很重要的正向反馈。”

“除了国内的顾客，国外的盲盒订单也有很多。”杨不正说。这些图书需要“漂洋过海”，才能来到读者手中。“我看到这种需要自己花很多邮费或者是偏远地区的顾客，都会尽量能多给一本就多给一本。”杨不正表示。

同时，他也告诉记者：“我现在还想做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把驾照考了，然后买一辆二手面包车，改装成书车，拉一些书在贵州跑一圈。既然我没有店，那我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把书送到顾客面前。”

在图书盲盒中寻找生活的“答案”

在普通书店的盲盒中，唐普放入了一种叫作“文学药丸”的文创，“药丸”由胶囊和内部的“文学药方”构成。正如“药丸”的隐喻一般，不少售卖盲盒的书店都会遇见怀揣着疑问的年轻人，他们来到这里，为自己的生活找寻一个“答案”。

所以书籍真的能成为生活的“解药”吗？读者张豆豆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她今年21岁，在购买人间食粮“不盲盒”的时候，她正处于非常迷茫的状态。张豆豆对记者说：“我当时正面临毕业和未来选择，很渴望有人能以他人的视角向我提出建议。收到盲盒后我非常惊喜和感动，有一种被耐心聆听和被治愈的感觉。”

来自上海的读者王一琳则表示，店主从“对话录”中“看见”了自己的困惑与理想。“现实中我其实受到很多打击，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拷问人生的意义。当局者迷，收到店主回信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被什么所困扰。盲盒中共5本书，我现在已经看完两本了，剩下3本我也饱含期待。”

在《乐黛云集》中,回忆“北大国宝”的一生

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戴锦华说，乐先生是“五四之女”“大时代的儿女”，称她终其一生“一次又一次自觉、坚定地走向暴风雨”。

戴锦华认为，乐先生代表了一种“中国文化自信”，从一开始便是如此，但是这种自信从来不是一种盲目的自大。“乐老师延续了五四文化精神里对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对中国文化的自我检视。正是在这种坚决果敢的批判、拒绝、扬弃的过程中，她不断地去发掘、重新整理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的遗产，赋予这样的遗产以新的生命与新的可能性，以及一种新的与世界对话的角度和位置。”

《乐黛云集》（十卷本）囊括了乐黛云在比较文学基本理论、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比较诗学和跨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所有著述，是其学术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也是其个人生命史的大总结。其中所收录的自传、散文和序跋以及第十卷中他人对乐先生不朽事业及丰富思想的评述，不仅是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史的生动档案。

有其人，乃有其文，见其文，亦可见其人。对于每一位倾力在世界语境中贯通思考古今中西问题的读者而言，此十卷书必将开启并持续一次次永恒精神对话所不可或缺的思想酵素。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张辉在《乐黛云集》序言里写，乐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

张辉写道：“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归结起来说，先生所做的一切——她的比较文学研究实绩、她对北大精神的阐发和继承、她对和与同两者关系的深刻思考，都朝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和而不同，多元之美。”

《乐黛云集》第一卷《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是乐先生的自传。全书共分为9个部分：“思想性格的萌生”“初出家门”“难忘的年代”“重返北京大学”“大洋彼岸”“新的学术生涯”“我与文化热”“料想不到的1980年代的终结”“1990年代：从文化热到国学热”。

《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这本自传既生动记录了乐黛云先生个人生命经历和家庭故事，是一部私人生活史，也折射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的风云变幻。书里提到的各种思潮以及文化热与国学热、理想与信仰、文学与科学等问题至今令人深省。

而像《乐黛云集》的第四卷《我的比较文学之路》，则以时间为序，系统呈现了乐黛云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40余年不断推进并拓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与个人心路。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由复兴、发展、壮大到日益繁盛的漫漫征途，乐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沟通中外，履痕处处；述往思来，目光深远。这一卷描绘了乐先生个人的比较文学求索之路，亦为读者展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成长与开拓的缩影。

戴锦华认为，乐先生的文集记录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关口”——彼时中国的世界视野发生巨大转变，从此前的亚非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向欧美打开、转移。“在这样一个转移过程中，乐老师的工作包含如何把中国放置在完整的世界版图中国，重新获取并且自我定义中国的位置，以及中国文化在其中的价值、启示及其可能性的作用。”

酒三多书店的图书盲盒被读者称为“树洞盲盒”，在备注中，有很多人向店主诉说自己境遇：“在近乎理想的环境待过，却无法留下，想有些治愈的不费脑的。”“秋天来了，好像是自我暗示似的，心情也不大好，我觉得自己在酝酿伟大的事情，陌生的城市生活了快5年也依然没有归属感，很孤独，又好像这就是我，命运使然。”

对于书店店主而言，有时他们并不能给予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他们仍然相信，阅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年轻人慰藉与指引。“有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困惑，尤其是年轻人的困惑其实出奇地相似，比如很多人会问到如何平衡生活与理想。”高贵兵表示，“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阅读它不是所谓人类必需的，但它是最便捷获取思考，获取认知的一个手段，它能帮我们超越自身已有的经验。我们如果可以看得更广阔，会发现世界上任何事情其实不是非此即彼，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作二选一的抉择，它们之间有一片广阔的地带。”

高贵兵认为，书籍可能并不能解决这些生活中的问题，但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另外的可能性。因此，他在“不盲书盒”的介绍中写下：把盲盒作为一种方法。

而获得了这种方法的年轻人，也的确在开拓新的可能性。张豆豆告诉记者：“收到盲盒后，我开始放平心态面对未来，这些书告诉我，不管面对任何事情，它们都会指引我往更好的方向前行。我开始注重当下的感受，更清晰、更平和地看待自己。”

徐想想也表示，她愿意由此去邂逅自己未曾预见的可能性，接触自己或许从未涉及的经验世界与思想版图。打开盲盒的一瞬间，她形容自己“像是心里的宇宙被开启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隋冰、陈牧池、张豆豆、徐想想、唐普、王一琳为化名）

阅读观

□ 王钟的

《魔术师》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我一时难以给出能说服自己的界定。

以书中大量虚构的对话、心理描写而言，《魔术师》当然是一本小说；但从作者科尔姆·托宾对主角托马斯·曼的深刻洞察来看，它又像是一本人物传记。那些充满灵动的描述，让我阅读时常常恍惚：自己究竟是在读一部充满想象的文学作品，还是在观看一部纪录片。

如何在具体创作中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听完托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场分享之后，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本人。托宾的回答是：“我读了托马斯·曼与家人、朋友之间的通信，也读了他妻子的回忆录，根据这些素材提供的时间、地点等事实，再加入自己的创作。”

托宾认为，基于人物真实经历的核心事实，是小说的“脚手架”，这是小说家不能改变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写小说就像盖一间房子——基本事实确立了房子的框架后，如何补充房子的细节，就是小说家施展本领之处。

无论是《魔术师》还是《大师》，托宾的作品无疑开创了一类文学新范式：以看似严密的编年体为骨架，却以丰富的细节想象填补文学的血肉。这种范式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指向了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的边界。

用那句被说烂的话来讲，文学源于真实又高于真实。实际上，即便是完全虚构的作品，也从来不乏努力找到现实影子的“考据派”。有人会对对照作者的生平年表，在小说角色的经历里找作者的“自我投射”；有人会翻查地方志、地图，确认故事里的街道、建筑是否有现实原型；甚至有人会逐字比对作者的访谈与作品细节，试图还原某个情节的创作初衷。这种对作者及其创作心态的“八卦”，也构成了读者尤其是粉丝独特的阅读乐趣。

在德国文学史上，托马斯·曼是一位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1901年，年仅26岁的他便凭借《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举成名。随着《魔山》等一系列代表作的问世，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二战爆发后，因坚决反对纳粹独裁统治，托马斯·曼被迫携家人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他通过演讲与文章持续抨击法西斯主义，也因此赢得了超越文学领域的广泛尊敬，战后甚至一度成为联邦德国首任总统的热门人选。

即便是追求严谨的传记作家，其作品也常面临巨大争议。这通常源于公众对传主的固有认知、作家本人的主观立场，或是传记材料取舍的不同。托宾选择托马斯这样的著名历史人物为小说题材，且毫不回避其性格中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甚至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当属大胆的尝试。

“小说家可以是不大负责任的。”在近期中国行的另一次分享活动中，托宾回应道，他可以抽取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再进一步延展自己感兴趣的內容。“如果我把搜集到的资料给在座的任何人，或者给ChatGPT、DeepSeek，每个作者都会挑出不同重点来写，故事讲法也会完全不同。”

拿《魔术师》来说，托宾选择这一题材，与托马斯·曼的出身密不可分。托马斯幼年成长于德国北部小城吕贝克，家族财富在当地颇具实力。因此，幼小的他成了小城的“小王子”，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对他投以羡慕的目光。

托马斯·曼的这段早年经历，与托宾的生活有着奇妙的呼应。托宾自己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镇，父辈与祖辈都在当地生活，从小也是在邻里街坊的注视下长大的。这种体验和到大城市后的感受截然不同：在小镇，人人都认识你；可到了大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游魂”，没人认识，也没人关心。

托宾还提到自己与托马斯·曼在家庭生活中的相似性——两人都是多子女家庭中的第二个儿子。他调侃道，“大哥就是你一辈子的‘麻烦’和‘血压压制’”。

在真实的历史中，托马斯的哥哥海因里希·曼也是一位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励着托马斯走上文学之路，但因为创作观念、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差异，托马斯与海因里希长期处在一种微妙的关系。

“正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托马斯相吻合，我才会对他的早年经历引发兴趣，并围绕这一部分进行创作。”托宾对此毫不避讳。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写《大师》的时候，正好想买房子。所以就去看亨利·詹姆斯有没有买过房子，了解他是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买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专门写了一章讲他买房的事。别人读同样的资料，可能会不写这个，但我会。”

在托宾眼里，对托马斯·曼、亨利·詹姆斯等人的书写，其实是在写他自己的“秘密自传”——写作者个人在乎的事，但把情绪寄托在另一个人（角色）身上。

“我觉得不管写什么小说，本质都是这样：你写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构建和想象一段人生，也希望能让读者产生兴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想象角色的‘孤独时刻’——让他们独处，看他们会做什么、想什么、感受什么、回忆什么。”

在对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进行研究时，托宾探访了王尔德曾被关押的监狱。到了那里，他请工作人员把自己锁进王尔德当年居住的牢房。在“被收监”的5个小时里，他再次阅读王尔德写给朋友的长信，后来被单独出版的《自深深处》。

“牢房有很高的小窗户，从那里能看到天空，你现在看到的和100多年前他看到的一模一样。”托宾觉得，在那5个小时里，自己感受到了王尔德的存在。

说到这里，托宾的文学观念已然清晰：真实是地基与坐标，确保人物的生命轨迹不偏离其精神底色；而虚构则是潜入人物灵魂的通道。尤其在那些无人窥见的孤独时刻，用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与强大的共情，为作品注入温暖的血肉。

这也解开了我初读《魔术师》时的疑惑，托宾说，我感受到的那份“既像小说又似传记”的恍惚，或许正是文学最动人的魔力：让我们在真实的底色里，读懂作家用想象力书写自己内心的真诚。

托宾的『秘密自传』



《乐黛云集》（十卷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乐黛云先生去世一年多了。今年深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群人相聚北大校园回忆起乐先生时，不约而同提起一幅画面：乐先生生前总爱佩戴色彩鲜艳的丝巾。

近日，庆祝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4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乐黛云集》（十卷本）发布会上，当一行字“爱戴紫色丝巾”出现在一段乐先生视频中时，现场嘉宾会心一笑，视频里乐先生也笑得灿烂。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提到，当年乐先生的打扮很时尚，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像乐先生这样喜欢穿特别明亮艳丽衣服的女老师很少，故她每次登场，都让人眼前一亮……着装的时间与学问的前卫，二者其实互为表里，故值得一提。”

乐先生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的恩师。戴锦华动情地说，乐老师的学术与事业“从来不在大学的围墙之内”——乐先生始终关注社会、关注世界，更牵挂底层与苦难中的人。

当我们阅读《乐黛云集》时，我们重新走进那位93岁“北大的国宝”的生命旅程。

乐黛云（1931—2024）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开拓者、奠基人。她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